

史沫特莱与胡适的一段往事

史沫特莱,美国左派记者、作家和社会活动家。1929年初她来到中国,对中国革命做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宣传。胡适,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播种者。这样两个看似不可能有交集的人,从近年披露的两封信中可以看出,在历史长河中,却曾实实在在走到过一起。

1929年8月10日,史沫特莱在给老友玛格丽特·桑格夫人的信中声称,胡适有极强的“生物冲动”,并说“告诉你一个秘密,如果我要的话,我可以把他搞得家庭破碎”。1930年1月30日,史沫特莱措词强硬地要求胡适,必须两天后带蔡元培去她家和印度教授嘉维见面。信末,她调侃甚至不无嘲讽地告诫胡适,如果你不听话,“有一天我会写文章证明你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”。

胡适日记中的史沫特莱

胡适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史沫特莱,是他应史沫特莱的要求带蔡元培前去会见印度教授嘉维。1930年2月1日,胡适在日记中写道:“下午与蔡先生夫妇同去史沫特莱家中吃茶,主客为印度嘉维教授和他的儿子。嘉维教授是印度女子大学的创始者,今年已71岁。其历史可敬佩。”胡适当天还对嘉维教授来华的有关报道作了剪报。可能是由于嘉维教授在中国停留的时间短,所以史沫特莱才要求胡适必须于2月1日带领蔡元培前来会面。胡适做到了。虽然从史沫特莱的信来看,此信有嘲讽调侃甚至命令胁迫的意味,但从胡适对嘉维的认同来看,也应包含着胡适一定程度的自愿与积极。

胡适日记中第二次出现史沫特莱,是当年8月份他去青岛度夏乘船回来从报上读到史沫特莱的一篇文章,在日记中写了一点评论。1930年8月17日日记:“船上有旧报纸,中有转载史沫特莱在美国报上记载《中国革命之诗人》一文,其中多可笑的话,如说独秀是创造社健将,简直是瞎说。此人成见极深,我和志摩都同她相熟,她极赞成苏俄,又极赞成印度的民族运动。”虽然胡适认为史沫特莱的这篇文章有很多“可笑的话”,但从胡适日记的语气看,胡适是以平静的态度来看待的,甚至可能是“微笑”着来记日记的。因为“我和志摩都同她相熟”,在胡适那里,可能认为她才来中国不久,还存在着许多误解。

视史沫特莱为“朋友”

正是由于胡适和她相熟,所以当史沫特莱与宋庆龄等人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,她把胡适拉了进去。1933年2月1日,同盟北平分会召开第一次执委会议,胡适被推举为分会主席。然而不久,由此和史沫特莱以及总会产生了矛盾,胡适被开除。

虽然胡适为此很恼火,认为加入民权保障同盟是“自取其辱”,但由于热河战事爆发,日军侵占承德等地,他很快投入到参与组织东北热河后援会,迅速将此事放了下去,同时,在心里,他仍然视史沫特莱为“朋友”。

1936年,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的安排下,史沫特莱到达西安,住在临潼。西安事变发生5天以后,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,史沫特莱在与周恩来

交谈之后,“我能感觉到他们不是来寻求报复的,而是要为一个团结统一的新时代铺平道路”,并开始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,驳斥各种关于张、杨兵变的“无耻澜言”。胡适得知这个消息时,于1937年1月11日致信傅斯年:“昨夜有人听见史沫特莱(志摩与我的朋友,是一个共党)在西安广播,我未听见。”

胡适虽然知道她是一个“共党”,但仍然敢于说她是自己的朋友,由此也可看出,虽然民权保障同盟一事让两人关系降到了冰点,史沫特莱将他的会员资格开除了,但胡适并没有从心里将史沫特莱从“朋友”中开除。

史沫特莱对胡适的影响

胡适与史沫特莱应该是什么时候从相识到相熟的呢?根据本文开头所引的信,胡适与史沫特莱应该在1929年上半年就应该很熟了。

但这里存在一个极大的“困惑”,根据史沫特莱自己的记载,她是1929年元旦以德国《法兰克福日报》记者身份到达哈尔滨的,并在东北呆了将近三个月。胡适此时在上海公学担任校长,当年曾于年初去过北平,时间是1929年1月19日,2月25日离开。而这个期间史沫特莱还没来北平。之后,至少到8月10日,胡适根本就没来北平。因此说胡、史二人在北平见面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
那么史沫特莱什么时候来的上海呢?美国著名学者珍妮丝·麦金农和斯蒂芬·麦金农二人根据大量史沫特莱的资料,用了14年时间所著的《史沫

特莱: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》作了交代。史沫特莱实际在北平只呆了两个月时间,她于当年5月就到了上海。从5月到8月,3个多月时间,二人相识相熟就有了足够的时间。

遗憾的是,胡适日记这3个月断断续续的,没有相关记载。

那么这3个月,两个人真的能发生什么吗?

史沫特莱自己在1930年6月23日写给老朋友的信中说:“我会有男人做朋友……中国人对我的反应就可以说明我有数不清的、对我无限忠诚的朋友。”麦金农夫妇的书也写道,“她同他们一起参加雅致的宴会,有时在月光下乘黄包车兜风……她的这些朋友中,最为西方熟知的是胡适”,作为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“教父”,且一直风流潇洒儒雅,要想在中国知识界开展工作,抓住了胡适,就等于抓住了牛鼻子,何况两人又年龄相当(胡适比史沫特莱仅大一岁)。

如果史沫特莱抓住了胡适,那么那段时间她给胡适带去了什么影响呢?

从微观来看,1929年,是胡适在《新月》上批评国民党政权最多且最猛烈的一年,计有7篇之多。正是这些批判,才使得他遭到国民党的围攻,以致不得不于1930年5月19日辞了中国公学校长,11月28日撤离上海搬回北平。

看一下时间,大部分文章正处于胡、史二人交往的高峰期,特别是观点,胡适越到后来观点越激烈:“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,便是国民党油干灯尽之时”。

据《南方周末》李传玺/文

宋时轮曾三度入党

开国上将宋时轮曾三度入党。在之前被“开除党籍”,以非党军事教员身份踏上长征路,直到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,他担任红十五军团作战科长之后,才恢复了党籍,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党的组织。宋时轮之女——宋百一在《我的父辈在长征中》,回忆了这段往事。

1934年初春,我父亲宋时轮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受伤痊愈后,踏进了向往已久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的校门。后因“AB团”嫌疑,他被开除了党籍。被“开除党籍”之后一个月,他因考试成绩优异,被红大调任上级指挥科的军事教员。1934年10月,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。为适应形势的需要,中革军委决定组成红军干部团,红军大学编为干部团上级干部队,团长陈赓,政委宋任穷,参谋长钟纬剑。在长征出发前,钟纬剑找父亲谈话:“由于你有一些军事技术,现在准备带你随学校出发。”

我父亲并没有因为被开除党籍而消极工作,而是积极认真地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。

1935年10月,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,先后派出一批同志到红十五军团工作。

毛泽东亲自找我父亲谈话,要他出任红十五军团作战科科长,协助参谋长主管部队作战。我父亲带着委屈表态说:“这么重要的部门派一个被开除党籍一年多、至今没有予以恢复的非党干部去是否合适?”毛泽东问:

“怎么回事?”宋时轮如实地陈述了事情的原委。毛泽东说:“用人之长是组织的事,恢复你的党籍也是组织的事,请你服从组织安排,愉快地到红十五军团报到工作。”毛泽东的话,让我父亲心情格外激动。

当时,蒋介石调集东北军五个师,沿葫芦河构筑“南北封锁线”,采取先封锁,后“东西对进,南进北堵”的战略,企图将红军主力聚而歼之,达到摧毁陕甘苏区的目的。红一方面军首长看透了蒋介石的心思,计划着直罗镇战役。这个战役是我父亲到红十五军团参与部署首次作战行动。我父亲亲自动手草拟了一套战斗文书,提出方案,部署诱敌进入直罗镇。11月20日,敌先头第一〇九师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、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,在阎家村北山担任警戒的部队为了诱敌深入,示弱抵抗,使其进至黑水寺,当夜即被红十五军团分割包围。

11月21日,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同时对直罗镇发起攻击,国民党第一〇九师几次向北突围都被击退,师长牛元峰率残部500余人退入镇东南的土围子待援。23日夜,牛元峰组织突围,被红十五军团消灭,牛元峰毙命。

直罗镇战役结束后不久,由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以及钱钢介绍,我父亲再次入党。后经组织确认,他的党龄从1927年算起,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党组织。

文汇/文